中国人的"捆绑式思维"

芦笛

一、 引子

这题目是铁木的启示，"捆绑式思维"这词就是这小子发明的。我早就有这方面的想法了，苦于一直找不到准确名称来指代中国人中非常典型的思维习惯。本来想在《挖枪拆网记》批驳为六四屠杀辩护的"功利派"的观点时具体演示，但刚才见老河提起这问题，正好碰上这话题，于是就觉得不如先来个鸟瞰，等大家有点概念后再举六四的具体实例来说明。

大家都知道，老芦大言不惭地宣称上网是来疗愚的。但不知道这并非我的初衷。我是在网上摸爬滚打好几年后才有了这个想法，主要原因是我发现，所谓"理科学者"尽管无比自豪地以所谓"理科思维"骄其妻妾，傲视文科学者，可一旦出了那个窄窄的专业谈政治或历史或其他人文学科的玩意，立刻就蠢不可言，连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都没有，什么智力笑话都有本事闹出来。上网 8 年多，我见过好几位在本行非常成功的理科学者，但除了老非老东西和狼主席外，其他无一不是笑话：马悲鸣、林思云、黄叶、樊弓、寒树、鲁肃……（以出场先后为序），无一不比为他们鄙视的文科学者蠢多了。其所以如此，乃是他们被自己的专业坑了，动不动就想使用"数理比喻"来穿凿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却意识不到这和文人使用文学比喻代替论证非但毫无区别，甚至更蠢。

这发现令我非常困惑：文科学者不懂逻辑思维可以理解，为何理科学者也会如此？而且还教都教不会！例如马悲鸣，我花了八九年的光阴教他"A=B"与"A 是 B"是两回事，到今天他还是不懂；又如樊弓，我写了几万字教他怎样作逻辑定义，到最后他也没学会；鲁肃则连我说的"验算"是什么意思都没那悟性领会。除了马悲鸣外，这些人据说都是成功的专业人士，例如樊教授不但是美国数学教授，还颇以"内外双修"自豪，声称他不但在我党头牌理论杂志上写政论，而且还到欧洲第一流学府讲学，可人家就有那本事什么最低级的逻辑笑话都能闹出来。

有趣的是他们还要来和我打架。有点文化的人从事网战，其实不光是比骂才，更是比思维严密。他们自己的思维千疮百孔，怎么还可能 stand any chance？我当网霸的看家功夫，无非是抓住那些破绽，以恶言毒语尽情嘲弄一番罢了。楼下 light 看了我当年的骂文，说："一个字，毒。"不知道他是否悟出来，那骂之所以毒，乃是非常准确地而且刻薄犀利地指出了所有的逻辑破绽，让挨骂者连还招的可能都没有。

后来我在国内开了博客，便开始陆续收到读者来信，多数是青年，各个学科的都有，似乎都有大学文凭。来信都是那个套子：看了"芦老师"许多文章，豁然开朗，觉得我的思维方式为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非常新颖而且有用，要看更多芦文，我能不能给他们寄去，让我为他们开个书单，等等。几乎所有的人都要使用"醍醐灌顶"

的成语，让我觉得又好笑又可悲，觉得思维方式真是国人的大问题，各科的通病。

老河这家伙就是有学问，看的书比我多多了，特别是现代书籍（我自上大学后就没再看过文史哲——历史人物传记除外），他今天说：

"理性思维是人的基本思维形式，分为'逻辑思维（logic thinking）'和'非正式逻辑思维（informal logic thinking）'。前者主要用于包括神学研究，数理分析和科学研究；后者用于几乎是除去前者以外的所有领域（但不包括艺术思维）。说它是'非正式逻辑思维'，我以为是因为逻辑思维乃是人的理性思维基础，如推理判断比较总结计算归类等等，都是逻辑思维的普通形式。非正式逻辑思维用的是人类把逻辑学正式作为一门学问分出前就有的所谓'自然语言'，它并非不是逻辑思维，只是用自然语言来表述归纳和演绎这样的逻辑过程而已。它的好处是把逻辑分析的运用领域扩大了，可以用来对付日常生活里的各种政治经济等问题。"

这种分类指出了逻辑思维在不同领域中使用时的共性与特点，但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需要强调的还是两者的共性。我认为人类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两种，前者用于艺术创作，后者用于除了艺术创作外的一切学科。无论哪一科，只要是搞学术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基本思维方法都是那一套，根本就没有什么"文科思维"与"理科思维"之分。上述病态现象之所以出现，恰是因为中国理科学者不知道这一点，更没有真正掌握数理思维的精神实质，悟出该怎样融会贯通，将其应用到专业外的领域中去。

套用黄仁宇的"大历史"一语来说，他们只会"小思维"，不会"大思维"，只会在专业领域里娴熟地使用从师傅那儿学来的具体思维方式，不知道如何把它的精神实质用到其他领域里去。于是在其他领域里，他们便只会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全靠原始天资，使用民间流行的传统思维方式。这就是理科写手中蠢货特别多的原因——他们受的专业教育对"行外思维"毫无帮助。在专业之外，他们完全成了文盲。这就是我为何高频度地使用这个词来骂他们。

因此，老河认为"非正式逻辑思维"容易失真的原因是感情因素的干扰，对中国人来说，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就是思考者无论学历职称有多高，绝大多数都是文盲，靠自家的原始天资，使用民间流传的传统思维方式在那儿应付。可惜我党那文盲党不懂这些，在改革开放后大量使用理工科干面包治国。其实我看这些人除了多了一点科普常识外，和毛时代的工农干部恐怕也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这就是理科学者看到我谈论历史、社会的文字时觉得耳目一新，闻所未闻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我使用了理工科的思维方法，因为这在他们看过的文科学者写的文章里从来见不到。中国文科教育的一个严重失误，就是西学东渐时先贤们误以为中国缺的只是理工医农，文科则早就有了，不必从国外引入，因此从来不知道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用的还是古已有之的死记硬背，而所谓研究也就是古已有之的考据训诂，参考书目的长短就是衡量论文质量的指标。

这其实是误会。我使用的当然是理工科思维方法，但同时也是西式文科学术研究的方法。大众之所以觉得新颖，是因为中国的文科学者很少使用西式文科学术研究方

法，用的是祖传功夫。而我之所以会这套，乃是我青年时代觉醒时，看了许多西方文史哲名著。到西方后虽然没再碰那些东西，但始终爱看历史人物传记，所以早就知道，真正的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其实和我本行用的本质上并无区别。

因此，老芦真没什么名堂，大家之所以觉得新奇，老河甚至说出"阅读芦文是一种experience"的话来，全靠中国文科学术研究一直没有走上正道，于是无论文科理科，见到我的史论自然要觉得新奇：文科学者没见过；理科学者觉得似曾相识，但过去从未想过原来"理科思维"也能如此应用到文科领域中。记得北徙小友刚来此地时，看了我的史论后发感慨曰：我从未想到原来史学研究也可以作概率比较，我还以为学文科就是博闻强记涅。

这大概也算一种 novel experience 吧。不过光荣并不在于我，我不过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来了一枝微不足道的芦笛罢了。早在《再谈不读或少读中国书》中交代过了，我在青年时代也感受过这种 novel experience，那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与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所以啊，本人卖弄的乃是偷来的招，没什么了不起。要说天资，还是老非老东西那绯闻人。他老人家没有这种后天学习历史，青年时代老老实实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蹲在农民大炕上，腰上扎根偷来的电线，嘴上叼着废报纸卷的"老头牌"磨合烟（也就是土产烟叶直接卷成烟卷，那玩意劲大的可以杀人，抽一口头上就像挨了泰森的一记直拳，我从来没本事尝试），响亮地咳嗽一声，对着屋角更响亮地吐了口痰。这辈子大概也没看过本逻辑教科书，可天生就知道使用逻辑思维考虑一切问题。

那么，中国既有的民间流传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种就是铁木说的"捆绑式思维"。

二、 他们的分析和我们的分析

"分析"这个词，无论在政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频率都非常高。记得伟大领袖在他的三字经中就说："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可见这"分析"似乎也可以算成是个国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然而不幸的是，从古到今，明白这词的意思的中国人似乎还真没几个。大众心目中的"分析"，似乎也就是"讨论"、"研究"、"琢磨"的同义语。即使是哲学专业人士，顶多也只会机械背诵逻辑教科书上的定义，却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他们。它是中国始终没能从西方引入的思想方法（除了下文提到的个别例外），而这恰是西式思维最基本方式。

因为没学会这招，它也就构成了东西方思维方式最显眼的差别。所谓"捆绑式思维"就是相对于"分析式思维"而言的。季羡林指出，西方人长于分析式思维，中国人长于"综合式"思维，这话前半截倒是完全正确，后半段则暴露了这位大师连常识都没有："综合"乃是相对于"分析"而言的，没有分析岂有综合？世上岂有不加分析的综合？他那话应该修改为"西方人长于分析式思维，中国人只会捆绑式错乱思维"才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早在旧作《未掣鲸鱼碧海中》中指出过了：

“有时我异想天开，幻想如果外星人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分别来到东西方，开着小车兜了一趟风，然后扔下车走了，当地人的反应又会如何。老英们的反应是不用说的：他们一定会老老实实地把那玩意儿一点点拆开，一个元件一个元件地研究过来，然后又把它们拼装起来，最后琢磨出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们拿手的‘分析’和‘综合’。咱们的老祖宗们的反应也可以猜出：他们一定会把那奇肱国的飞车供在大屋顶神庙中，然后就回家闭门冥思苦索，用阴阳五行加上‘理’、‘气’、‘血’、‘脏腑’、‘经络’等等玄妙的观念来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却到死也决不会想到去拆开那玩意儿，看看自己的猜想到底对不对。”

这儿已经解释了逻辑学所谓“分析”和“综合”到底是何意思。这俩词在英文中分别是“analysis”和“synthesis”，和许多外来词汇一样，还原为英文反而更容易准确清晰地理解。类似例子还很多，例如“必要”与“充分”若还原为 necessary（必需）与 sufficient（足够），则连文盲都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又如“结缔组织”一语，我过去不懂英文时，早就在科普刊物中看见多次，从来不明白是何意思，后来学了英文单词 connective tissue 才恍悟：NND，原来是“连接组织”的意思阿！无非也就是杀猪时见到的那些筋筋吊吊，机体靠那些“麻线”把瘦肉、肥肉、皮肤、骨骼等等连接在一起。当初翻译此词的先贤何以只顾卖弄典雅文采，故意不让外行知道那是何意？如此翻译还不如不翻译，直接引入英文单词算了。

总而言之，分析就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第一步。要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个事物，某个现象，某个过程，其前提就是把它先尽可能地拆开，分解为一个个单元或一个个的步骤，再研究每个单元或步骤的作用或效应，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然后再把它们拼装起来，得出对总体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必经途径，不先把事物拆开，就绝无可能认识到它的本质。换言之，认识事物的必经过程就是“先分解后合成”，中国人夸耀的“整体思维”只存在于咱们的自慰妄想中。

这说穿了一点都不稀罕，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连孩子都本能地懂这套。家兄芦箫小时老是挨打，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好奇心实在太强，大人给他买的新玩具立刻就要被他细细拆开，研究里面到底是什么名堂，拆开了又没本事装起来，于是便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浪费了大人的钱，当然挨打罚跪就是天然合理的。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古代中国人就是不懂。上面讲的“奇肱国飞车”虽是虚构，但绝非恶毒嘲讽，中医的出现与发展就最典型不过地代表了中国人的“捆绑式认识客观事物”的独特方式。自扁鹊以降，大家都在那儿搞“人体科学”，可两千多年下来竟然就没人想到必须打开那黑匣子看看，到底里面是不是《黄帝内经》说的那回事。向壁虚构，闭门造车，发明出一套理论来，居然也就能用来指导防病治病，于是便让后人认定那是认识“人体科学”的高明途径，至今神话流传不歇，还成了现代国人引以为傲的“整体思维”的光辉范例。

后来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拜乾隆爷，为了炫耀本国文明，向我大清证明他们也是文明古国，并非蛮夷，特地精心挑选了许多代表当时文明成就的奇技淫巧作为“贡品”。

后来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发现那些礼物原封不动地收藏在宫殿中。满朝文武就竟然无一人有那好奇心，建议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名堂！

最令人想不通的还是，古人不懂也倒罢了，西学东渐一个半世纪之后，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似乎还是不懂这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大多数文科学者压根儿不懂这套，理科学者则只会按本行师傅传下来的规矩，弓马娴熟地拆车装车，拆装效率与速度甚至可以比师傅还高，却从来没有意识这么做的理由何在，更没有意识到其实其他学科包括社会科学也在搞这一套，只不过人文学科拆装的不是"物"而是"事"罢了。换言之，所不同者，拆装的对象也，方法则都是一样滴！

这是什么意思？凡有初中数理化常识的读者应该都能理解。现在请大家回忆当年学的那点皮毛。初中学的平面几何教你证题解题。那靠"整体思维"是绝对解不了的。你得先去把那简单的几何图形拆开了，研究各组成单元（边角等等）之间的关系，从已知条件出发，根据几何定理，逐步查明那些单元之间的关系，推出一系列的推论来，最后到达要证的命题。

这就是分析法。它的精神实质是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各单元，从已知事实出发，根据业已确立的自然规律、数学定理或人世常理，一步步推导出未知事实，每一步都必须有充足理由或曰证据（符合已知事实和科学规律、定理或人世常理）。

物理学又何尝不如此？要明白物体的运动，你就得把研究对象拆开，简化到最低单元（质点，刚体等），再研究这些单元之间的联系：谁是受力者，谁是发力者，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是什么，力和运动有何相干......等等。

化学也是这样。天然存在的物质都是混合物。要想知道它们的性质，就必须把这混合物分开，纯化出单一物质来，弄明白这纯净物后，再把它进一步拆开，看看它们究竟由什么元素组成，一直拆到不能再拆的单质为止，然后再研究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谁跟谁可以化合，谁跟谁不能化合，等等，等等。

由此可见，所谓自然科学研究，说穿了就是个拆装倒卖外国走私进来的好车，没什么稀罕的。

但奇怪的是，古代中国人从来不懂这套，不信请诸位去看看古籍。尽管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使用了这个研究客观外界的唯一可行手段，不但完整建立了整个平面几何学体系，还提出了原子论的天才猜想。但古代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家兄芦箫那种拆玩具的强烈冲动，一直停留在"整体思维"的搞笑阶段中。即使是今天，如果我不在这儿说穿，恐怕许多人至死也悟不出这个自然科学的基本研究手段来。哪怕他们是本行的拆卸高手，也未必知道其所以然，更不会知道其实别的行当也在搞这个。

文科学人就更不必说了。现在请大家回忆初中的文理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文科不兴解题，语文只有点语法造句，最重要的就是作文，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卖弄文采。历史作业就是放录音机：大事年表，历代"武起义工程纪要"，等等，等等。这里需要的就只是个记忆力和表达力，教师从来不教学生如何拆卸某个历史现象或社会现象，从已知事实中推导出未知事实来。

三、一个不可知论者的自白书

刚才匆匆看了小衲小友的批判，发现自己前文走了偏锋，让大家以为遇到方舟子那样的科学教徒了，其实我早在《"辩证法"是最强大的"致愚教"》中系统讲述过我的世界观与认识论了。请误以为我是科学教徒的同志们用文章搜索去把那篇长文（一共五篇）找出来看看，省得以为我抵赖：）

那文章太长，这儿列个提纲吧：

1） 自然科学产生的原因，是人类将大脑固有的逻辑思维法则外推（extend）到客观外界去，认定（assume）自然界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在控制一切现象。这个认定是个永远无法无法证明或证伪的假设。到底是否如此，只有天知道，但人类要活下去、要发展就得采取此假定。

2） 自然科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这"客观规律"，由于大脑固有的逻辑思维法则的限制，找到的"客观规律"必须符合逻辑，这是人脑内在的限制。由此出现了两种困境：

A、 发现的规律不符合逻辑规则，亦即该规律被逻辑证伪，然而却就是成立。
B、 逻辑推理本身就会导致无法判别错在哪里的悖论（诸如芝诺悖论、罗素悖论）等等。

在以上两种情况出现时，人都一筹莫展。迄今为止，使用逻辑手段建立的量子力学得出了部分颠覆因果律的结果，把因果律从必然变成了或然。这和牛顿力学的经典概念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将来彻底颠倒了因果律，使得儿子出生在母亲之前，则我无法想象物理学在此后还怎么继续发展下去。

3） 因此，自然规律的确立，是康德所说的"人类用理性为自然立法"，它是不是真正存在，是不是就是人确定的那样，只有天知道。检验的工序是两道：首先是逻辑证伪（这是数学的唯一证伪手段），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第二道则是实验证伪，看它是否能通过实验的验证。但问题在于，即使通过了这两道验证，那仍然无法证明或证伪上述 1）和 2）两条假定，亦即：自然界确实存在着符合大脑思维法则的一套客观规律。谁也没本事证明这个主观认定，只有上帝（if any）才是人和客观世界之外的独立的第三者，因此只有他/她（们）才能证明（如果他/她【们】存在的话）

4） 上帝是否存在，超出了人类的理性（也就是逻辑思维能力），根本就不是人类可以认识的。此类领域称为形而上领域，诸如是否有造物主，宇宙的第一原因（first cause）是什么，是否有另一个世界，时空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等等，都既不能像数学那样用逻辑推导去求知，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以实验求证。硬要用理性去穿凿这些问题，就必然会导致康德所谓二律背反，亦即推导出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来，但逻辑上毫无错误。哲学也属于这个领域，因此它不是科学，类似艺术，只有高低之分，没有正误之别。谁也不能说唯心论是错的，也不能说它是对的，但可以说唯心论比唯物论的编造工艺更复杂精美。这些领域只能留给信仰，理性只能用于信仰

的编造工艺，无法用以判别信仰的正误。

5） 可以算在形而上领域里的大概还有所谓 paranormal or supernatural 现象，诸如心灵感应、telepathy，psychic，ghost，等等。但这些东西不是科学研究对象，无法用逻辑和实证手段探索，是不可能为人类深入认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采用存而不论的态度。

6） 逻辑是上帝（if any）赐给我们的人类认识自然界的唯一手段，尽管它有很明显的局限，但好用不好用都是它了。若嫌它不好用而把它扔掉，咱们就成了两手空空无产阶级。过去我党把大家的双足砍掉，把形式逻辑当成"形而上学"（=犯罪，我已经解释过，毛共的"形而上学"观念跟哲学里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毫不搭界）批，要大家换上无法行走的义肢"辩证逻辑"，这结果就是使得全国人民特别是伪知识分子们统统变成智力残废。

7） 正因为此，不采用逻辑手段，就不可能建立科学。这就是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古人 somehow 不懂这玩意，只有荀子与之擦肩而过。

8） 所以，中医不是科学，它的理论不是靠逻辑手段建构的，连逻辑证伪都无法通过，更不曾采用分析法，采用实证手段来验证。这根本不是国人自吹的"综合法"，作为认识方法，综合法是使用逻辑手段将弄清了具体性质、功能、与其他组分的相互作用的各个组分拼装在一起得出的理论体系，而中医根本不是如此建立起来的。

9） 中医的建立过程：中医的建立可命名为"借腹怀胎法"，或更准确地说是"强奸生子法"，亦即以固有的先入为主的哲学观念（例如阴阳虚实）和原始的物理概念（寒热表里）、自然现象（风寒暑湿燥火）以及人体感觉（酸甘辛苦咸）等，强加到人体或药物上去，将病体的一系列症候群主观地分为"阴阳虚实寒热表里"等"证"（="症"），再以药物作活体实验，经过几千年用人作豚鼠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终于在药物和主观规定的症候群中摸索出了对应关系，于是药物相应也就获得了"寒热""补泻"的"药性"，可以分别用去治疗"寒热虚实"等"证"。这当然是人类粗暴地为自然立法，可惜没有使用理性，更未将人体拆开，在弄清器官、组织、细胞的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探索病因、病理、药理等等。

10） 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医是有效的，未便一笔抹杀，但它是一种黑箱操作，是靠数千年的原始野蛮的人体实验盲目摸索出来的经验手段。因为它没有使用逻辑手段和科学实验手段（毕竟"神农尝百草"算不得科学实验），所以绝非科学，缺乏科学必需的规范性、可重复性与确定性，但它也不能算是艺术，过去我因为看到良医庸医判若云泥，与艺术家的表现颇为相似，因此认为它是艺术，这看来也不准确——诊断治疗并不是一种主观创作活动，不能因为中医临床实践缺乏规范性和确定性便将其认为是艺术。

11） 由上可知，中医代表的中国认识方式，是一种原始的认识方式，它与西方引入的科学认识方式的差别，是它无法深入探索研究对象（古代中医从来就没有试图探索人体），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注定只会僵化死亡，没有前途可言。而且，它的适用范围有限，只能用于可以使用亿万"豚人"作活体试错的个别领域里。以前文举

的奇肱国飞车为例，如果古代中国人见到宝马车，用建立中医的方法去研究，便再过一万年谅古人也没本事把它开起来，遑论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12） 这种思维方式用在自然科学里倒不是什么问题，反正自然科学没有中国人搅和人家也能对付，没有吃，没有穿，自有红十字会送上前；没有奇肱国飞车，自有鬼子为咱们造。但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使用捆绑式思维就是咱们政治疯病周期性发作的认识论原因，起码是原因之一。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坚决拒绝捆绑思维，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跪倒求饶，
对着捆绑思维我放声大笑
白痴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不可知论者的自白
以恶言毒语戳穿浆糊思维的搞笑

二、 他们的分析和我们的分析

“分析”这个词，无论在政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频率都非常高。记得伟大领袖在他的三字经中就说：“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可见这“分析”似乎也可以算成是个国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然而不幸的是，从古到今，明白这词的意思的中国人似乎还真没几个。大众心目中的“分析”，似乎也就是“讨论”、“研究”、“琢磨”的同义语。即使是哲学专业人士，顶多也只会机械背诵逻辑教科书上的定义，却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他们。它是中国始终没能从西方引入的思想方法（除了下文提到的个别例外），而这恰是西式思维最基本方式。

因为没学会这招，它也就构成了东西方思维方式最显眼的差别。所谓“捆绑式思维”就是相对于“分析式思维”而言的。季羡林指出，西方人长于分析式思维，中国人长于“综合式”思维，这话前半截倒是完全正确，后半段则暴露了这位大师连常识都没有：“综合”乃是相对于“分析”而言的，没有分析岂有综合？世上岂有不加分析的综合？他那话应该修改为“西方人长于分析式思维，中国人只会捆绑式错乱思维”才对。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早在旧作《未掣鲸鱼碧海中》中指出过了：

“有时我异想天开，幻想如果外星人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分别来到东西方，开着小车兜了一趟风，然后扔下车走了，当地人的反应又会如何。老英们的反应是不用说的：他们一定会老老实实地把那玩意儿一点点拆开，一个元件一个元件地研究过来，然

后又把它们拼装起来，最后琢磨出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们拿手的‘分析’和‘综合’。咱们的老祖宗们的反应也可以猜出：他们一定会把那奇肱国的飞车供在大屋顶神庙中，然后就回家闭门冥思苦索，用阴阳五行加上‘理’、‘气’、‘血’、‘脏腑’、‘经络’等等玄妙的观念来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却到死也决不会想到去拆开那玩意儿，看看自己的猜想到底对不对。”

这儿已经解释了逻辑学所谓“分析”和“综合”到底是何意思。这俩词在英文中分别是“analysis”和“synthesis”，和许多外来词汇一样，还原为英文反而更容易准确清晰地理解。类似例子还很多，例如“必要”与“充分”若还原为 necessary（必需）与 sufficient（足够），则连文盲都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又如“结缔组织”一语，我过去不懂英文时，早就在科普刊物中看见多次，从来不明白是何意思，后来学了英文单词 connective tissue 才恍悟：NND，原来是“连接组织”的意思阿！无非也就是杀猪时见到的那些筋筋吊吊，机体靠那些“麻线”把瘦肉、肥肉、皮肤、骨骼等等连接在一起。当初翻译此词的先贤何以只顾卖弄典雅文采，故意不让外行知道那是何意？如此翻译还不如不翻译，直接引入英文单词算了。

总而言之，分析就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第一步。要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个事物，某个现象，某个过程，其前提就是把它先尽可能地拆开，分解为一个个单元或一个个的步骤，再研究每个单元或步骤的作用或效应，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然后再把它们拼装起来，得出对总体的认识。这就是认识的必经途径，不先把事物拆开，就绝无可能认识到它的本质。换言之，认识事物的必经过程就是“先分解后合成”，中国人夸耀的“整体思维”只存在于咱们的自慰妄想中。

这说穿了一点都不稀罕，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连孩子都本能地懂这套。家兄芦箫小时老是挨打，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好奇心实在太强，大人给他买的新玩具立刻就要被他细细拆开，研究里面到底是什么名堂，拆开了又没本事装起来，于是便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浪费了大人的钱，当然挨打罚跪就是天然合理的。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古代中国人就是不懂。上面讲的“奇肱国飞车”虽是虚构，但绝非恶毒嘲讽，中医的出现与发展就最典型不过地代表了中国人的“捆绑式认识客观事物”的独特方式。自扁鹊以降，大家都在那儿搞“人体科学”，可两千多年下来竟然就没人想到必须打开那黑匣子看看，到底里面是不是《黄帝内经》说的那回事。向壁虚构，闭门造车，发明出一套理论来，居然也就能用来指导防病治病，于是便让后人认定那是认识“人体科学”的高明途径，至今神话流传不歇，还成了现代国人引以为傲的“整体思维”的光辉范例。

后来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拜乾隆爷，为了炫耀本国文明，向我大清证明他们也是文明古国，并非蛮夷，特地精心挑选了许多代表当时文明成就的奇技淫巧作为“贡品”。后来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发现那些礼物原封不动地收藏在宫殿中。满朝文武就竟然无一人有那好奇心，建议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名堂！

最令人想不通的还是，古人不懂也倒罢了，西学东渐一个半世纪之后，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似乎还是不懂这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大多数文科学者压根儿不懂这套，理科学者则只会按本行师傅传下来的规矩，弓马娴熟地拆车装车，拆装效率与速度

甚至可以比师傅还高，却从来没有意识这么做的理由何在，更没有意识到其实其他学科包括社会科学也在搞这一套，只不过人文学科拆装的不是"物"而是"事"罢了。换言之，所不同者，拆装的对象也，方法则都是一样滴！

这是什么意思？凡有初中数理化常识的读者应该都能理解。现在请大家回忆当年学的那点皮毛。初中学的平面几何教你证题解题。那靠"整体思维"是绝对解不了的。你得先去把那简单的几何图形拆开了，研究各组成单元（边角等等）之间的关系，从已知条件出发，根据几何定理，逐步查明那些单元之间的关系，推出一系列的推论来，最后到达要证的命题。

这就是分析法。它的精神实质是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各单元，从已知事实出发，根据业已确立的自然规律、数学定理或人世常理，一步步推导出未知事实，每一步都必须有充足理由或曰证据（符合已知事实和科学规律、定理或人世常理）。

物理学又何尝不如此？要明白物体的运动，你就得把研究对象拆开，简化到最低单元（质点，刚体等），再研究这些单元之间的联系：谁是受力者，谁是发力者，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是什么，力和运动有何相干……等等。

化学也是这样。天然存在的物质都是混合物。要想知道它们的性质，就必须把这混合物分开，纯化出单一物质来，弄明白这纯净物后，再把它进一步拆开，看看它们究竟由什么元素组成，一直拆到不能再拆的单质为止，然后再研究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谁跟谁可以化合，谁跟谁不能化合，等等，等等。

由此可见，所谓自然科学研究，说穿了就是个拆装倒卖外国走私进来的好车，没什么稀罕的。

但奇怪的是，古代中国人从来不懂这套，不信请诸位去看看古籍。尽管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使用了这个研究客观外界的唯一可行手段，不但完整建立了整个平面几何学体系，还提出了原子论的天才猜想。但古代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家兄芦箫那种拆玩具的强烈冲动，一直停留在"整体思维"的搞笑阶段中。即使是今天，如果我不在这儿说穿，恐怕许多人至死也悟不出这个自然科学的基本研究手段来。哪怕他们是本行的拆卸高手，也未必知道其所以然，更不会知道其实别的行当也在搞这个。

文科学人就更不必说了。现在请大家回忆初中的文理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文科不兴解题，语文只有点语法造句，最重要的就是作文，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卖弄文采。历史作业就是放录音机：大事年表，历代"武起义工程纪要"，等等，等等。这里需要的就只是个记忆力和表达力，教师从来不教学生如何拆卸某个历史现象或社会现象，从已知事实中推导出未知事实来。

五、分析法是人类认识客观外界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前文贴出后，小衲同志不同意，和我争论了一番，这争论很有助益，让我认识到自己没把话说清楚。另外，他的看法不仅颇有代表性，而且是本文可能遇到的水平最

高的质疑与反驳，因此这争辩是非常及时的，是完全必要的，为此必须再阐发一下自己的主要观点。

我认为，分析法（analysis）乃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奇怪而且不幸的是，西学东渐前，中国人从未跨过这一步，代之以错乱思维。这种错乱思维的表现形式很多，诸如模糊思维，牵强附会，"强奸生子法"等等，捆绑思维不过是最常见的一种。王泓网友质疑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词？的确，光用这个词也不能全面总结国人的思维错乱，但我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名称了，之所以最后选定它，是因为它比较准确地道破了国人至今引以为荣的"整体思维"的实质。

我觉得最丧气的是，不会分析法也罢了，国人还非要发明个好听名称来掩盖这种智力失败不可，好像咱们的老祖宗早在两千年前便高瞻远瞩，为今日科学发展指明了康庄大道。这幻觉若不打破，则咱们只怕要在浆糊桶里打滚打到天使加百列吹响号角，宣告末日审判到来的那一天。

如我理解不错，小衲同志对我的批驳主要是这么几点：

1、作为认识客观外界的手段，分析法是有限的，表现在：

A)光用分析法并不能得知事物全貌。即使把研究对象的所有组分的结构功能查明白，也未必能理解整体行为和功能。

这我毫不反对，但这只是对分析法的误解。分析法并不是认识的全过程。它是认识客观事物的第一步，要完成认识还必须使用综合法。小衲举的那些例子，说的其实是综合法遇到的困难，并不是分析法的失败，更不能证明分析法不是必要过程。

当然，他有这种感觉也很自然，如路过网友指出的，如今科研已经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从事的都是具体的甚至 trivial 的分析，只有少数大师在干综合的活。我辈苦力干多了这种活（这其实就是我提前退休的原因），难免把由科研当成了只使用分析法，而这就是季大师闹出来的空前常识笑话。如果西方只分析不综合，只拆不装，则科学界早就成了瓦砾场了，哪来一个又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B）分析法在实施中遇到的技术困难：到底分到何处为止？

我不知道，建议去问丁肇中老前辈：）我知道的就是，这和我谈的主题毫不相干。本文旨在证明掌握分析法乃是中国人学会"非正式逻辑思维"的前提。现代国人不学会这一招，就永远只能做古人式的蠢人，并不是讨论国家有无必要斥巨资建大型加速器。

2、分析法不能适用于某些研究对象，这些对象只能用黑箱理论研究，而据说中医乃至民间迷信就是黑箱理论（后者是 zzzz 网友的主张）。

分析法确实有它的局限，并不是万能的。小衲举出的经济现象就是例子：该怎么去

分而析之？他还没说气象学。要作出准确的天气预报，该怎么去分解之？人类目下可做的，无非也就是用卫星跟踪云的走向，分析气压变化等等，用计算机建立模型瞎猜一气罢了。地震就更是狗咬刺猬，从哪儿下嘴都不知道了。

这些困境我都知道，但它们和本文主题是两回事。我并没有鼓吹"理性万能"，遑论"分析法万能"。木猪网友已经指出，本人曾多次撰文指出理性的局限，认为人类是不可能彻底认识客观世界的。尽管如此，人类也只有假设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否则就是 defeatism。上面那些分析法的应用局限，我认为是理性的局限的表现之一。黑箱理论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乃是一种凑合对付。它是否会在未来成长为人类常规的（classical or conventional）认识途径之外的一条旁路（alternative pathway），老芦才疏学浅，实在说不上来，但哪怕真如此，这也并不是否定经典途径的理由。牛顿力学并不因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就失去意义，只不过是适用领域不同而已。

最重要的还是，即使黑箱理论是认识论中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那也不能证明中医、《易经》、周文王神课乃至民间迷信等等是伟大的智慧灯塔，为人类认识活动指明了方向。中医确实可以视为一种黑箱操作，但它和黑箱理论的唯一相通之处，只在于"不想弄明白具体机制"这一点。它之所以具有实际用途，乃是因为使用了类似用活人去趟地雷的试错法。

至于《易经》、《推背图》之类，我已经说过了，那属于理性无法认识的怪力乱神，只能存而不论，因为不可能使用科学手段去研究它。个人当然可以把它当成研究课题，但在宏观范围内，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介入形而下领域的科研活动，更不可能也不应该作为指引人类认识的智慧之灯。并不是所有持此种主张的人都是无神论者或科学教徒。本人是不可知论者，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他们并无二致。更何况把这些怪力乱神与黑箱理论、地震预测等等拉在一起，我个人认为是蓄意搞笑，旨在娱乐大众，一如我故意使用"荨麻擦屁股"的粗俗表达搞笑一般。

3、某些研究对象不能使用分析法，只能作整体分析

小衲举了鱼群行为作例子，说研究群体动物的行为时，使用分析法毫无用处，即使把个体查得清清楚楚，也不能据此预知群体行为，只能将整个鱼群作为研究对象。

这我完全知道，还曾经在纪念五一六通知的长文中特地剖析了个体行为心理与群体行为心理的差异，藉此说明群众运动的危害，但小衲在此混淆了几个概念：

第一，本文讨论的是人类整体认识活动的必经途径，不是个别具体研究领域中的方法难题。

第二，"整体分析"也是分析，所谓 top down 用的还是分析法，只是分解对象不同而已。小衲误以为分析就只是空间上的分析（这也是我那奇肱国飞车寓言可能具有的误导作用），其实还有时间上的分析。群体动物行为分析作的乃是时间上的分析，例如遇到什么情形鱼群会有什么反应，在排卵期，交配期的回游途径又如何等等，这些用的仍然是分析法，并不是什么与分析无关的纯粹的 top down，世上没有不用分

析的"整体研究"，无非是分解单元不同罢了。

第三，个体行为当然与群体行为不同，但这不等于可以不必研究个体心理。我早在纪念五一六通知的文章中指出，大规模暴民集群之所以会出现以攀比为突出特征（例如竞相比赛悲壮崇高，竞相比赛血腥残忍等等）的群体催眠现象，乃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急于获得群体接纳乃是个体天性的一部分。在幽居独处时这种天性没有表现机会，但在群体集合时，个体就会本能地与群体"调谐"，以获得群体接纳。由此可见，所谓整体研究还是离不开个体分析。

第四，群体由个体集合在一起而形成，与单个动物由不同器官组成是两回事。医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群体而是个体。因此，即使"群体研究不能使用分析法"能成立，也不能用它来证明"中医使用'整体思维'就是有理"。

总而言之，即使把群体行为分析看成是"整体思维"，那也与中国人传统的智力障碍毫不相干。我实在不知道令现代国人如此自豪的"整体思维传统习惯"到底是什么东西，还请精通这套思维方式的国学高手以实例示教。

以上乃是对网友质疑的答复，下面接着写正文。

为什么说分析法是人类认识活动必经的第一步，而西学东渐前中国人始终没有达到这一步，以致季羡林先生必须发明"西方人善于分析，中国人善于综合"，其他国学大师要发明"整体思维"、"本体论" 等常识笑话，以此向文明世界开展"自慰战争"呢？

这道理显而易见：人类的认识对象是客观事物，要么是"事"，也就是事件、现象等等，要么是"物"，也就是物质物体等等。"事"在时间上是连续的，表现是多侧面的，而"物"则多是大杂烩。如果你要用"整体思维方式"去认识它们，便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它们怎么一回事。

以梨子为例。在古人眼中，它似乎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但现代人都知道它是个非常复杂的大杂烩。要明白它的实质和功能，就必须使用各种手段去一步步分解之：梨皮和梨肉是由什么组成的，梨皮的颜色是从哪儿来的，梨子的味道又是怎么产生的？……这样一代代人接着分解下去，直到查明了那大杂烩的各种组分，将这些知识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综合起来后，才能明白产生那些表观性质的机制是什么：能充饥，是因为它含有淀粉和其他糖类；甜，是因为含有葡萄糖、果糖等等；酸，是因为含有有机酸；颜色则来自于甾体化合物；能治疗牙龈浮肿则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维生素……

这就是鬼子认识事物的方式：一点点拆开，一步步深入，不这么做，就绝无可能认识事物的实质，以及产生那些表象的原理。

中国人又是怎么做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

此乃文盲大老粗认识论的经典名言。不幸的是，几千年下来，中国人就是用这种大老粗方式认识客观事物的。老祖宗们想知道的就是梨子的滋味和它的用途，研究了几千年的结果就是：

“梨：

[性味归经] 性凉，味甘微酸，入肺、胃经。

[功效] 生津，润燥，清热，化痰。”（说明：本人未能查到《本草纲目》，引文来自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请注意这“求知活动”的醒目特点：

1、研究目的明确：对象的保健用途。

2、知识水平低下：感性层次（“味甘微酸”）。

3、体现了主观“变革”客观的粗暴行为，亦即将无从验证也不想验证的主观虚构的“归经”性质强加在研究对象之上。

4、通过“经验试错法”得出了功利性的“抽象”性质：“性凉”（亦即它可以用来治“热”症），以及在医疗保健上的具体用途（“生津，润燥，清热，化痰”）。

这当然也是认识活动，它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就是作“反面教材”生动演示，不去解剖研究对象，层层深入剖析之，代之以“整体思维”的“囫囵吞梨”，究竟能使得人类获得何等水平的认识。

此例的意义还在于，它提示了“整体思维”的发生机制，那就是古代中国人没有西式的“客观”、“主观”观念，只有“物我”之分，这就是他们为何没有西式的“真 / 非真”的观念。在古人眼中，世界分为“物”与“我”两部分，“我”是主，“物”是仆，“物”是为“我”服务的。此所谓“驱万物为我所用”，它的余绪就是鲁迅著名的“拿来主义”。

换言之，古代中国人使用的是主观主义的视角，也就是把自己当成坐标系的出发原点，用功利的眼光去打量周围的一切，用原始的经验试错法去研究万物的用途，决不放过任何一种潜在食物或药物。这就是中国式认识活动的根本目的。

既然物我之间是仆主关系，当然古人也就不会产生西式“求真”观念，只需向仆人单向赏赐封号就行了。这就是不但中医方剂学有“君臣佐使”之分，而且无聊文人竟然在植物界分封群臣，将花草分成高贵的王侯和下贱的侍婢。后一例虽然只是无聊文人所为，但在认识论上，它与中医理论并无实质区别——两者都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而且从来没想到过要去验证。这种“主人翁心态”，与西方人把“是否为真”（亦即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当成中心问题完全是两回事。似乎可以说，在认识客观外界时，古人在下意识中流露了某种暴君心态，这才从来不会想到去“明察暗访”、“查明下情”，却认定“我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古代天文学研究也同样表现了这种主观暴君心态。我在旧作中介绍过，被今日中国人吹到天上去的"浑天仪"其实是个笑话。从"天圆地方"的"理论"出发，古人制作了一个能转动的金属圆球，很像西方用的地球仪，但那不是地球而是"天球"，上面刻了太阳、月亮和星星，以此来模拟肉眼见到的苍穹的旋转。这就是中国古人对宇宙的认识：大地乃是平地，放在旋转着的空心"天球"中。换言之，我们是住在一个"皮球"中，看到的天空就是那"皮球"的内表面罢了。

这当然也没什么可笑，其他民族有的是比这更可笑的世界观。但令人震骇的是老祖宗的"主人翁心态"之顽固。我已在旧作中介绍过，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在明代来到中国，参与制作了"浑天仪"和其他天文仪器。他们当然知道"天圆地方"的可笑，试图将当时欧洲争论的中心话题"日心说"介绍给中国同行，不料对方却漠不关心，觉得那争吵什么意思都没有——管它谁绕谁，只要能准确预报日食月食，测定二十四节气不就完了么？

过去我只用功利主义去解释这怪事，现在我才觉得，其实钦天监官员们的反应乃是标准反应。布鲁诺若来中国宣传日心说，我敢担保他嘛事没有，谁也不会有兴趣理睬他那些疯话。倒不光是因为大众觉得毫无用处，更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真／非真"的观念。世上竟然会有些国家为了某个理论是否违反客观真实吵到天昏地暗，甚至有人为此被活活烧死或坐牢，这种咄咄怪事完全超出了中国人的理解范围。"为真献身"（通译为"真理献身"）的事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人只可能因冒犯权贵或违反圣人主观规定的道义掉脑袋，最近似于"为真献身"的事也就是为平反冤案而送命。

六、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

以上举出的例子，无论是奇肱国飞车，还是梨子，都是物体在空间上的分析，很直观也很浅显。但学过中学数理化的人都该知道，自然科学研究中除了空间上的分析外，还有时间上的分析，两者常常结合在一起。物体运动就是范例：质点从 A 点运动到 B 点。要想知道它在两点之间任意一点的快慢，你就得时间分割成无限小的单元，再以质点在该时段内通过的位移除之。这基本原理每个高中生都知道，可知道它是分析法在物理学上的研究的人恐怕还真没几个，正如一般人不知道微积分为什么又名"数学分析"一样。

其实，离开了分析法，我们就连把时空观念兑现到日常生活中都不可能。哪怕糊涂如中国古人，也没用"整体思维"去比较时间或空间。他们毕竟还知道，若不把时间或空间分解为等长的单元，再以对象具有的单元数目来作定量比较，则连人的寿命长短都无法比较，更别说确定邯郸到咸阳与大梁到咸阳的距离孰远了。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同样如此，但它研究的是"事"而不是"物"，亦即"事件"或"现象"，因此无法使用实验手段去直接分解之，只能在头脑里作抽象分析。不仅如此。"事件"一般涉及多方面的人事，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内的想法与行为都未必相同，这就使得空间和时间的变化错综在一起，变得非常之复杂。可惜中国人从

来不知道该怎么去研究它，却代之以漫画式的"整体思维"。

老河已经指出，这就是外来的"辩证法"和中国的"整体思维"一拍即合的原因。他还指出，中国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孤立片面静止"的思维方式。我和他的分歧，只在于他认为这套思维方式于今已经显得过时或狭隘，而我认为人类官能内在的固有的限制决定了人类只可能采用这种方式。

这道理其实很浅显：人类没有能力研究处在运动中的物体，只能把它固定静止下来，人为地把那连续过程分成不同阶段，一个个地去研究。例如跳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要明白它，你就得用高速摄影机把全过程拍下来，再去研究一个个静止画面，把那连续过程人为分解成"助跑"、"起跳"、"空中肢体运动"等阶段，再逐一琢磨各阶段该怎么发力才符合运动生理学，最大效率地发挥人体的潜能。

研究细胞分裂的连续过程也是这样。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上讲的所谓"细胞分裂周期"的各阶段，其实也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其精神实质与上述跳高过程完全一致。同理，所谓"经济危机周期"那些"高涨——萧条——复苏"等阶段也是人为划分的。总之，要明白物体运动机制，你就只能将其过程人为分解为不同阶段，使得它如芝诺的飞箭一样，"冻结"在每个时段上，逐一研究明白了每个时段内的变化后，才可能获得全过程的连续图像。

类似地，人类只能"孤立片面"地去认识事物，这也是人脑的固有限制决定的。"辩证法"强调，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可惜"辩证法"家们偏偏忘记了"一心不能二用"的生活常识，以为可以用"整体思维"去将大千世界尽收眼底，却不知道人脑只能有一个兴奋中心，一段时间内只能研究一个事物，绝无可能靠"全息感知"认识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要了解全过程，就只能分别研究一个个事件，这样才能拼装出全景来。

人在观看球赛时其实就本能地运用了分析法。球赛乃是典型的 team work，同时发生多人竞争或互助。除了疯人院逃出来的观众外，没谁能以注视全景的方式来看它。所有人的眼睛都跟着球走，只看得见球周围的几个人。至于离球较远的运动员在干什么，谁都不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孤立片面"认识方式，人只能用这种方式认识互动的多个事件。咱们之所以能看懂球赛，乃是因为咱们在无意识中把时间分割成了无限多的片段，在每一个片段只看最关键的球员，与此同时将它与已在大脑中储存下来的片段组装起来，这才能明白大致过程。

正因为此，个人认识必然是孤立片面的，事件规模越大越如此，足球赛需要的裁判比篮球赛多，原因谁都知道——一个人看不过来。但即使全场观众的眼睛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查明某个球员在某个瞬间干了什么事。要查明双方的每个失误，就得在录像上全程检查每个球员。

其实我也不用说那么多，以阅读为例就够了。要明白一篇文章，您就得作类似的空间与时间的分解，逐一扫描每个字每句话，弄明白它们的意思，再在脑子里综合起来。在这点上，天才与庸人毫无区别，阅读速度只反映了理解速度与大脑综合处理被分解的信息的效率，真正"一目十行"的全息式摄入，不是人脑可以胜任的。

比起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来，足球赛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然而咱们就是敢用所谓"整体思维"来"研究"它。这谁也说不出所以然的高明的"整体思维"，在我看来与疯子呆看足球赛也差不多。

当然，要说这"整体思维"丝毫不用分析法，那也不尽然。国人擅长的分析法，就是为伟大领袖发扬光大到空前绝后的"两分法"。如同儿童一般，古人把人划分为两种："好人"与"坏人"，在政治生活中也就是"忠臣"和"奸臣"。两者之间的"路线斗争史"，也就是中国的全部文明史。

这儿童思维到了现代便发展为"阶级分析"。虽然伟大领袖使用从苏俄进口的思想方式，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经典名著，将社会解剖为几个阶级，并分析它们对社会剧变的不同态度，但那只不过是在"黑－白"、"忠－奸"、"好－坏"、"敌－我"的两极世界中，增加了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中间分子"而已，如伟大领袖指出的："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虽然"中"貌似"非黑非白"，但它其实是"非黑即白"，是双方的争取对象和必须警惕的动摇分子。于是，过去的"忠奸斗争"给改成了"阶级斗争"，"忠"改成了"被剥削阶级"，"奸"改成了"剥削阶级"。内涵虽然变了，所指仍然分别对应于"好"与"坏"。据此，伟大领袖的经典语录其实可以诠释为："阶级（善恶）斗争，一些阶级（坏人）消灭了，一些阶级（好人）胜利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就是两千年下来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进步"。

不仅如此，这儿戏两分法还是静态的，只限于空间的分解，与时间无关。因此，一旦做了好人，就时时处处都是好人，反之亦然，世上绝不会有先好后坏、先坏后好、时好时坏、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人。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人，其性格的某个侧面仍然可以具有亮点，依然可以在某个瞬间流露善意，或是真诚地做出件把好事来，这图景对中国人的头脑来说是过于复杂了。

以此孩童头脑去透视历史，历史便变得一目了然，无比清晰明快。《三国演义》就是最佳示范。

《三国演义》大概是对中国人影响至深至钜的一部书，其对中国历史影响之深远无从估量，似乎再没哪本书超过了它。它不仅制造出了俨然与孔子分庭抗礼的"武圣"关羽，为民间社会提供了比孔门七十二贤人还更家喻户晓万倍的道德楷模，成了游民文化经典，为没文化的暴乱土匪和入侵蛮族提供了军事教材，哺育出了中国人的"唯谋略论"或"谋略至上主义"，而且熔铸了元代以后的无数中国人的历史观，形成了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历久弥坚的传统思维定式。

本来，《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三国之间的极度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涉及的人物之多，事件之纷繁，影响因素之多，似乎并不亚于拿破仑入侵俄国，然而若从小说来了解这两个历史现象，读者所获判若天渊。

我初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感到极不习惯，甚至很不快，盖托氏的巨著没有一个鲜明的脉络，能让你"抓住牛鼻子"，"纲举目张"地去轻易把握历史事件。书中描写的人物之多，事件之纷繁，场面之浩大，视角之多元，令人目不暇接，根

本就不是国产经典历史小说里那些简洁明快的场景。罗贯中、施耐庵等人使用的是"整体摄影"，以上帝俯瞰尘世的方式，用放置在天上的固定镜头观察历史事件，从来不兴像托翁那样不断更换镜头，从不同层次的人的眼中观察那场战事。

最令我觉得震撼的是，托翁居然在该书中提出，战争其实是不可控的，因为无从预知的偶然因素太多，微不足道的变数可以影响整个战局的成败。他甚至提出，当法军溃退后，俄军追击与否，其实对结局毫无影响，因为法军的崩溃如同雪崩一样，一经启动就无法停止。即使俄军不追击，大多数法军也只会埋骨在俄罗斯的茫茫雪原之中。追击反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伤亡。

看了这些说道后，我觉得无比震惊，碍难接受——早在小学时代我就熟悉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战争方式，楚汉相争如此，曹袁斗智如此，诸葛亮与司马懿相持更是如此，就连岳飞与金兀术也是如此，如今老托却跳出来说，这定式完全是神话，战争不是某个熟读了《太公兵法》的摇鹅毛扇的智多星可以在事前点水不漏地策划的！

这就是我的"中国史观"第一次受到冲击。此后随着阅历增加，我才悟出，托翁虽然说得过头了些，但"虽不中，不远矣"。

例如韩信著名的"十面埋伏"，在说书人嘴里实施倒很容易，真要搬到战场上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光那埋伏的十支部队的协同联络，即使在通信手段极度发达的现代也不是容易的事。六四时，老邓调动各地军队入京"分进合击"，结果是一团糟。据西方记者研究，后期风传的"兵变"并非毫无根据，据说共军各部的确发生过火拼，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调动混乱、各部之间缺乏协同联络引起了摩擦与冲突。

滑铁卢战役的结局就最能彰显不能预知、后果无从控制的偶然因素的作用。战斗爆发前，拿破仑采取他惯用的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战略，不待反法联军完成集结即挥师挺进比利时，企图先消灭布留歇尔（又译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然后再掉头歼灭"铁公爵"威灵顿率领的英军。在法普两军交战时，普军被法军从中间楔入，溃不成军。只是因为戴尔隆将军误解了拿破仑的命令，普军才侥幸逃过被全歼的厄运。

拿破仑猜想布留歇尔想逃回普鲁士去，便派格路西元帅率军追击，自己则亲率主力掉头捕捉歼灭威灵顿率领的英军。威灵顿正指挥英军与内伊元帅率领的法军偏师作战，听说普军大败，立刻命令部队撤退，却被法军赶上。法军骑兵正要发动猛烈进攻之际，突然大雨骤降，法军只好停止进攻，英军得以侥幸逃掉。

威灵顿过去从未和拿破仑交过手，他与拿破仑不同，特别擅长防守。他摆脱法军追击后，立刻在滑铁卢占据了有利地形，专等拿破仑到他选定的战场来和他交战。于是拿破仑便失去了在运动中全歼英军的时机，被迫仰攻严阵以待的英军。

更糟的是拿破仑一直在害病，那天晚上通宵未能合眼，他需要的是住院而不是上战场。于是在次日的战斗中，他急躁易怒，几次犯了他在正常状态下未必会犯的错误。

次日他吃早餐时便犯了第一个错误，当索尔特建议将追击普军的格路西军召回，以加强对威灵顿的战力时，他怒气冲冲地拒绝了。

此后他强扶病体，故作轻松愉快状出现在三军面前，接受将士们的欢呼时，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他查看了地形，发现大雨使得地面松软，不利于搬运大炮以及骑兵冲锋，便决定推迟进攻，等到地面干燥些再说。

大约十点钟，他给负责追赶布留歇尔军的格路西元帅发出命令，令其向位于滑铁卢东北方的 Wavre 方向前进，目的是把布留歇尔兜赶到滑铁卢来，好让他在歼灭英军后与格路西前后夹击，包围歼灭普军。这是他犯的第三个致命错误。

法军终于在 11 点左右发起冲锋。拿破仑的计划是，佯攻处于英军右翼的豪格蒙特，将英军主力引去该地增援，然后集中大炮猛轰战线中央，大军再向英军左翼冲锋，突破防线，自西向东席卷英军，把英军赶下海去。

可这计划未能如意进行，威灵顿没有上当，只派了少量部队增援右翼，负责佯攻的内衣元帅把佯攻打成了真的，出动全部兵力，激战终日也没有攻下豪格蒙特。

中午时分，法国炮兵按原计划开火，轰击英军防线，可惜大炮放置得太靠后，无法准确瞄准，雨后松软的地面使得弹丸无法弹起而造成广泛杀伤（当时的炮弹是实心铁球）。炮火既未给英军造成严重伤亡，亦未如拿破仑预期的那样给他们造成恐慌。

下午一点许，拿破仑在望远镜里看到前来增援的普军前锋，立即命令追赶布留歇尔的格路西元帅赶来增援，但直到下午五点多格路西才接到这命令，而那时已经太晚了。

命运在此跟拿破仑开了个致命的玩笑。布留歇尔恨透了拿破仑，被打败之后并没有如拿破仑猜想的那样，一道烟逃回普鲁士去，而是一直在固执地寻找威灵顿军，准备与后者汇合，联手对付拿破仑。但他并不知道威灵顿在哪里，只能跟着猜想走，正在瞎摸乱走之际，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大炮声，于是他立即命令三军朝着炮声火速前进，赶去支援英国阶级弟兄，痛打法国阶级敌人。

负责追击布留歇尔的格路西元帅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也听到了炮声，部下也曾建议他向炮声火速前进，去增援友军。但他却决定严格按照拿破仑的命令行事，继续向滑铁卢东北方迂回，以便把布留歇尔赶到滑铁卢去。等到下午 5 点他接到拿破仑的紧急增援命令时，离开滑铁卢已经太远，不可能及时赶到了。

戴尔龙指挥第一军团开始攻击英军左翼，英军（其实是荷兰军，汉诺威军等杂烩，为行文简练简称英军）抵挡不住，已现败象，幸得英军及时以重骑兵增援，打退了第一军团的进攻，拿破仑投入预备队发起反击，双方反复来回拉锯，伤亡惨重，拿破仑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进去了，只留下禁卫军作为最后一张王牌。

下午四点左右，进攻英军右翼的内伊元帅看到英军中央有许多人向后方移动，他不知道那是运送伤员，却以为英军顶不住撤退了，于是便率领骑兵发起冲锋，但未组

织炮火协同射击，亦未组织步兵协同作战。英军步兵迅速排成专门对付骑兵的方阵，顽强抵抗法军。内伊反复发起冲锋都未能突破英军防线，双方都遭受了惨重伤亡，缠斗得筋疲力尽。到最后英军行将用尽弹药，到了溃败边缘，但铁公爵拒绝撤退，要部下坚持到普军来增援。

就在此时普军到达了，立即投入了战斗，威胁着法军的侧翼和后方。处此危局中，拿破仑仍未失去斗志，他将最后的王牌禁卫军扔了出来，企图突破英军防线中央。百战百胜的禁卫军勇士们不顾伤亡，攻上了山顶，却迎面撞上了威灵顿布下了纵深防御。此前老威令布防在山顶上的士兵伏在地上，躲在仰攻的法军的视线外。待到禁卫军终于攻上山顶，原来伏在地上的士兵们突然站起，在近距离内开枪，轰击毫不提防的禁卫军。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视死如归的禁卫军勇士们失去了勇气，干出了他们从未干过的事——掉头逃跑，于是法军全线开始溃败，败局于此注定。

检讨这次战役，法军的确犯了谋略错误，最主要的失误是拿破仑没有使用他惯用的侧翼迂回，而是正面强攻，企图从中央突破，恰好又碰上了最会打防御战的铁公爵，正是搔在对方的痒处。其次是内伊单独使用骑兵反复冲锋，直到把骑兵折腾完为止，而拿破仑竟不纠正这一错误。尽管如此，英军仍然险象环生，甚至濒临溃败。最后反败为胜，全靠普军在关键时刻投入增援。

但这关键事件之所以发生，完全是一系列偶然因素造成的：首先，如果拿破仑在击败布留歇尔后，追上撤退的英军后卫时，若不是突然天降大雨，使得法军骑兵无法冲锋，则威灵顿来不及布防，英军很可能就会被全歼，那么历史上也就没有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了；其次，如果拿破仑不是在病中，也就不会因为身体不适、心情烦躁而拒绝戴尔龙提出的把格路西军召来助战的建议。第三，如果不是因为下雨使得地面泥泞，不便于骑兵和炮兵行动，拿破仑就不会推迟进攻达几小时。若他一早就发起进攻，等到布留歇尔赶来时，英军也早就溃败了。第四，如果格路西和布鲁歇尔一样，听到炮声就赶来助战，或是如果拿破仑急召格路西来援的军令准时送达，则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这些因素都是致命因素，但都不可预知，无从控制。拿破仑乃是全世界公认的军事政治天才，连他都无法预知并控制胜败攸关的若干因素，而况庸人哉？

然而诸葛军师却从无类似问题。如所周知，中国人打仗，主要是靠主帅或军师神出鬼没的谋略。该同志"学究天人"，如上帝一般无所不知，洞察一切，事前就算定了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所谓"算无遗策"），接下来要做的事，也就是安排下天罗地网，静等鱼儿上钩。这完全是单向打击，甚至比张网捕雀、挖坑下象还简单。狩猎还有个猎物是否会来、来了是否会自投罗网的问题，但布阵打仗则毫无此类麻烦，对方一定会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如德国人的火车一般准时，绝不会让你失望，非但不会识破机关，遑论反击，只会严格服从你的指挥，而且绝不会碰到意外事件，因此你连中途修改原定计划，以因应战况变化的必要都没有。通讯联络就更不是问题了，绝不会有不知道敌军和友军在哪里的怪事。

"华容道战役"就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例。却说曹操数十万大军被周郎在赤壁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狼狈北窜。卧龙先生不但在那通讯和交通都极不方便的中古时

代及时得知了曹军的败讯，而且竟能算出曹军从哪条道逃走，在每条道上都埋下伏兵，只等曹操朝天哈哈一笑，便冲将出来截杀一通。最后笑出来的是关云长率领的五百名校刀手，至此曹军已经毫无斗志，只有束手就擒，但关云长念及老上司的情谊，放他走了。就连这也不是诸葛军师的失算，盖他小人家（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比周郎小）早就算定曹操命不该绝，不如让关云长去作这顺水人情，还了他欠下曹丞相的人情债算了。

那位说了，这是小说，你不能当真。当然，可惜这同时也是中国人理解战争与记录战争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小说即信史，信史即小说，两者之间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差别。不信请去《史记•淮阴侯列传》上看看韩信是不是这么打仗，或是去革命回忆录中看看毛主席是不是如此用兵。因此，我在上面说《三国演义》熔铸了元代以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其实也不对。从西汉直到今天，国人历来就是这么看待历史和战争的。

明白了这个文化背景，则不难立即看出"丁凯文学派"那干人形形色色的阴谋论是从哪儿发源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算无遗策的卧龙先生，而林副当然只能尊重中国传统，完整准确地按伟大领袖的既定方针办。

这些人连康生老婆曹轶欧都不如。据师东兵采访，人曹老太还有这点见识：

"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搞法，有人说是这个策划，那个密谋的。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来看，那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斗争逐步推进成那个样子的。就是连毛泽东也不知道斗争会发展成什么样式。当然，他对斗争的必胜和周密的安排那是不成问题的。"

七、不懂分析法的后果

前文贴出后，见到老河与他人的帖子，似乎都觉得我的观点太绝对、太过激。老河说，很多情况下需要系统思维，因此，也不能说"辩证思维"是扯淡。他还说："不同的思维方法都有它的价值，关键的问题是看人如何运用它，以及会不会运用它。但是，恐怕没有一种思维方法是万能的，唯一正确的。"

此话恕我不能同意，我坚持认为：

1、没有哪种思想是绝对正确的，但世上只有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那就是逻辑思维。它不是万能的，但是是"唯一正确的"。所谓"正确"，是说它符合人脑的固有特点。背离人脑的特点去认识客观外界，就只能得出《三国演义》式的哈哈镜像。

2、客观外界确如"辩证法家"们说的那样，是不断处在运动变化之中，万事万物都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人类确实必须全面地认识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中的无比复杂的客观世界。但这不过是"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类的永恒真理，说了等于不说。所谓"辩证法"只警告你："认识不能是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但从不教你怎么去达到这个目的。它并非一种思维方法，丝毫没有实用性，其实与思

维无关。硬要说有关系，也就是提出了对思维结果的要求。说穿了，它其实是一种口号，跟〝一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差不多。

3、全面地认识处于变化之中的复杂多元的事物，是人类共同的任务，并不是〝辩证法家〞们的独家发现。辩证家们的无聊口号反而制造了混乱，使得人类越发远离这目标。这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认识论的辩证法〞：客观世界是复杂的、多元的、运动变化的，然而人脑只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认识事物。分析—综合法就是在尊重这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是唯一能使思维结果逼近真实的途径。不遵循这个途径，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客观世界，就只能适得其反，而这就是中国古人犯的错误。现代对辩证法的宣传更助长了这错误，使得中国人基本丧失了思维能力，闹出〝模糊思维〞、〝纲式思维〞、〝强奸生子〞、〝捆绑思维〞等无穷无尽的笑话来。

一言以蔽之：只有清晰地、〝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去思考，才能认识一个模糊的、混沌的、多元的、复杂的、运动变化的客观世界。这就是认识论中的 paradox.

例如恩格斯的名言是：〝生命在某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什么东西。〞此乃千真万确的真理，与〝人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一样——组成您的机体的那些物质，自您出生之后不知已经更新过多少次了，唯一不变的只有纯精神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您的〝灵魂〞。但逻辑学的同一律恰好与之相反，它规定，在思索过程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须始终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偷换概念。

因为这矛盾，形式逻辑被辨证家们谴责为万恶的〝形而上学〞。他们不知道，人类要思考，就只能把概念固定下来，否则连最简单的问题都会让大众跌入浆糊桶，在里面吵得昏天黑地，吵到世界末日。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就是如此。当时的学者们享有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什么话都敢说（例如杨朱著名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但它的学术水平（亦即思维质量）从未到达古希腊的高度，主要原因就是古人不懂逻辑思维，不知讨论前先得界定概念，于是便只能鸡同鸭讲，各说各话，无法通过辩论深化认识。这并不是什么社会制度或集体主义价值观造成的（乱世是思想繁荣的温床，统治者顾不上镇压学者，社会也无法奉行统一的价值观）。类似情景又在民初出现，原因也基本是同一个。因此，似乎可以说，思想自由是思想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合理的思维方法则是高水平的思想繁荣的必要条件。

打个不确切的比方：人脑犹如人腿，只能让你在地上一步步走，顶多只能让你奔跑，但它不是彩凤双飞翼，不能让你飞起来。辩证家们的唯一贡献，就是发现飞翔比行走或奔跑更优越，因此号召大家把双腿斩去，在想象中插上翅膀，这结果就是把〝邯郸学步〞改成了〝北京学飞〞，使伪知识分子们统统变成了汉高祖宠妃戚夫人。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中国人特别强调把握全局，为此专门用〝盲人摸象〞、〝管中窥豹〞之类生动成语告诫大众，然而您若随便翻翻国学经典，立刻就能发现善于〝整体思维〞的中国人正是〝刻舟求剑〞、〝见目不见林〞的行家里手。

这种吊诡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费解：离开分析与综合，人类就无法把握全景。硬要

去把握它，就只能以主观去强奸客观，在多元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到一鳞半爪之后，便把它当成"决定性因素"或曰"主要矛盾"，据此建立一个"纲式思维理论"。作为不可救药的智力懒汉，咱们碍难接受西方那种"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的笨办法，却坚信世上就是有"万应灵丹"，找到它便如"抓牛要抓牛鼻子"一般把握全局。

人民的好总理已经把这浮躁心态表达得清清楚楚了："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时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成蹈海亦英雄。"上下求索，为的就是找那万应灵丹，但找遍了百科学术都找不到。即使如此，也要找下去，最后找不到就跳海死球了也是光荣的。难怪马列主义会跟中国知青们一拍即合。

前节所谈，也就是那许许多多的"牛鼻子"之一例。我无非是告诉大家，从《孙子兵法》开始，以《史记》中的《孙子吴起列传》、《淮阴侯列传》以及《三国演义》为高峰的"唯谋略论"就是这种纲式思维。它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唯一因素就是谋略，具有谋略优势的一方必胜。

用伟大领袖这位 "牛鼻子"专家的话来说，谋略就是决定战争性质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处在这"隧道眼"之外的，乃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民心、士气、生产力、经济、军制、军纪、将士战斗技能、武器、后勤等无数因素。无视这许多因素，恰恰是"整体思想家"们反复叮嘱大家千万要避免的"见木不见林"。您说这该有多荒唐，多可笑？可从远古起咱们就把这笑话奉为一种坚定信仰。《孙子兵法》有云：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 多算胜， 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 吾以此观之， 胜负见矣。"

这就是《三国演义》的写作指导思想，它把"庙算"当成取胜的充分必要条件。算得多的一方就必然胜利，哪怕没箭也没关系——诸葛军师自有办法从曹丞相那儿借来。您说这"整体思维"与真实图景相距有多远？

最无奈的还是，哪怕在反复挨了鬼子痛打后，咱们仍然难以放弃这"谋略至上主义"。伟大领袖之所以至今被许多国人奉为伟大的战略家，就是以为他凭谋略便能超越国力，将美苏两霸玩弄于股掌之上。

国人之所以执迷不悟至今，我也解释过了，那就是咱们没有西方人的"主观"、"客观"概念，不知道必须去验证主观想法是否符合客观（所谓"真"）。这就是为何国人在提出某理论后非但没有"验算"习惯，而且连自己在构思该理论时引入了哪些主观假设都懵然无觉。"丁凯文学派"闹的那些笑话就足以显示这一点。那些人提出的阴谋论尽管花样繁多，一个比一个更离奇，但基本假设都差不多，无非是这么几条：

1、毛林之间的斗争类似诸葛亮与司马懿，完全是单向进行的，一方布下罗网，另一方乖乖上钩，绝不会有伟大领袖如意算盘落空的事。

这就是老河观察到的我和他们看问题的方式的区别所在：他们根据已知结局，根据纲式思维的定式，虚拟了一个"一以贯之"的惊险故事，将符合该故事的零星情节特

地挑选出来作为"证据";我则从已知事实出发,逐一分析各方可能作出的决策,使用逻辑证伪逐个排除不可能事件,以此推导出未知事实,抽丝剥茧,一步步逼近真相。

2、伟大领袖洞察一切,不但对林家的情况了如指掌,直接控制李文普、潘景寅这些卧底特务,而且能与之瞬时联络,实行瞬时指挥,甚至连林彪的打算都洞若观火。

3、伟大领袖已经进入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化境,行使其意志丝毫不受信息摄入以及其他物质条件的限制,因此,他要想知道什么,立即就能知道什么,既没有耳目如何与他通讯的技术问题,也不存在雷达找到飞机的困难。他更可以肆无忌惮地把与副统帅的不可告人的肮脏搏斗,扩散到那个诡秘成性的黑社会基层组织中去。

4、林副毫无起码智力,不是任凭叶群和林立果摆布,就是让李文普玩弄出卖,要不就让周恩来或毛泽东乖乖牵着鼻子走。

以上四条中的"伟大领袖" 若置换为"人民的好总理",便成了"安魂曲学派"的基本假设。

这就是"纲式思维"的最新示范。它的特点正在于"整体性":一气呵成,流畅生动,如《三国演义》一般有趣,也如《三国演义》一般滑稽。两者都是用主观虚构的故事去把握全景,却连生活常识都忘记了。

如所周知,幼童的最大特点,是毫无"主观""客观"的概念,分不清什么是 reality,什么是自己的 imagination。这也是中国人的最大特点。许多史学工作者似乎根本不知道"假设"与"事实"的区别,直接就把自己的臆测当成事实讲给读者听。我过去批驳过的戴逸先生关于戊戌政变的论文,以及张戎女士"蒋介石为了蒋经国故意放走红军"、"毛用《伍豪启事》讹诈周恩来,使之终生臣服"、"胡宗南是共谍"等等,都是这种分不清想象和现实的生动演示。论本质,它们和"丁凯文学派"、"安魂曲学派"同源,都来自于"抓牛鼻子"的纲式思维。

因为"整体思维"必然导致主客观分离, "强奸生子"就是它的必然后果。以上范例都是主观强奸客观生出来宁馨儿。类似地,中医的"整体思维"也是这种把戏。中医在认识论上最大的意义,是它显示了医学理论竟然可以基本脱离人体而存在,其基本概念竟然在体内找不到对应物。它和"史学强奸生子"的区别,只在于两条:第一,它毕竟是现象学,总结了一系列确实存在的症候群("证")。第二,它使用经验试错法,人为赋予了药物"性味归经"的"属性",从而建立了天然药物与"证"的对应关系,使得"辨证论治"有了可能。而"史学强奸生子"则是不折不扣的画鬼——您即使能看出太史公编造的神话之无稽,也绝无可能知道秦二世或项羽死前真的说过些什么话。于是这强奸之子便只能一代代流传下去,而韩信便永远只可能是那个算无遗策的活神仙。

"整体思维"的另一种表现,就是铁木指出的"捆绑思维":

"还有就是反西藏反西方媒体的抗议,他们把不同的东西掺合在一起:西方媒体的偏

见问题（客观存在，也有结构性的原因），西方的殖民主义历史，关于西方对中国的阴谋论，西藏民族问题...把不同的东西打包在一起，不允许你就事论事，做单个判断，而是做一揽子判断。”

铁木似乎以为那是故意捆绑在一起的，我却觉得此乃国人最典型的"整体思维"。在国人看来，那正是完整地全面地把握了西藏问题的全景：西藏问题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而这是西方肢解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为西方殖民主义历史证明，汉藏冲突就是帝国主义分子为此挑起的……。总之，抓住了"西方妖魔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本来源"这个"牛鼻子"或曰主要矛盾，则"纲举目张"，一切疑难都迎刃而解了，世界变得通明透亮。至于那图景中有几分是 reality，有几分是咱们的 imagination，从来也就不在中国人的考虑范围内。咱们的主要关心所在，还是那故事是否激动人心。

八、庖丁该如何解牛？

这个问题是小衲同志提出的。记得他问我，该怎么分解一个现象，才能避免失于主观？

愚以为，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通用答案，只能讲讲我个人的一点粗浅体会。

科学研究涉及到的分解似乎没什么讲头。如阿越说的，如今科研乃是使用人海战术的社会大生产，不再是罗蒙诺索夫、牛顿、焦耳的时代，挂个香蕉猴子都会弄，无非是按照人家早就分割好的那个窄窄的领域，在那儿钻牛角尖而已，根本也就用不着你去伤脑筋。我想说的还是普通公民如何运用分析法去解构社会政治历史现象，以后凡事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批判认识，避免让权势集团乖乖牵着牛鼻子走。

在我看来，社会现象的解构无非是两重：横向的与纵向的。所谓"横向解剖"，是指把某个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并列的多侧面分解开，逐一研究之。

例如国际共运这个现象既有理论方面，又有实践方面，必须分别研究。它的指导理论乃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因此又必须作纵向解剖，弄明白三家学说的实质，这样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

我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作的解剖比较多，因为那是唯一有点学术水平的玩意，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过是一种工艺学罢了，算不得真正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由三部分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共产主义。青年时代我对他在这三方面的主要"发现"都做了清算，已经写在旧作里了。最主要的感想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乃是毫无可行性的乌托邦，它最基本的假设就是所谓"唯物史观"，而这玩意根本经不起推敲。

马克思根据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自私心理乃是私有制造成的，无产阶级因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所以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私心杂念。同理，当私有制一旦被破除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私心理也就相应丧失了。这就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天堂为何可以建立

起来。

国际共运投入了三分之一的人类来验证这 P 话，结果如何用不着我再说。"新"中国不但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的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就连生活资料都十分紧缺。不仅如此，党国宣传机器还开足马力，几十年如一日"灭资兴无"、"斗私批修"，但我从未见过马克思梦中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圣贤。相反，我认识的无产阶级多是鼠目寸光、贪得无厌，似乎还要比知识分子自私。他们强过知识分子的地方就是头脑简单，听到含蓄隐晦的反动牢骚也不明白涵义，不会去举报你，生活在他们中间比较安全而已。

我党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剥削阶级的影响，但我实在看不出剥削阶级是怎么影响我身边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文化生活已经给净化成了毫无杂质的蒸馏水，人类的所有正常欲望全都被谴责为罪恶。这反倒让欲望以扭曲的方式生长。周围的人都发生了严重的人格分裂，会上仁义道德，私下男盗女娼。

待我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后，才恍悟自私其实是人类的生物本性，是物种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人类的社会性可以局部地暂时地压倒生物性，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生物性。所谓"思想改造"完全是抽刀断水。

由此我更悟出，马克思把生产力当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完全错了，物质欲望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共产主义否定人类的物欲，恰好否定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如此人为制造出来的天国因为违反了人类天性，迟早要陷入死样怪气的停滞状态。这种病态生产关系才真正妨碍了生产力发展。

过去发现的破绽也得到了解释。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新社会的生产关系早就孕育在旧社会里了，因为旧的上层建筑不能满足它，于是革命发生，改变上层建筑，普遍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都如此，唯独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却并不存在于旧社会之中，必须由新政府去人为建立起来。过去我看出了这一理论破绽，却不明白那其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违反了人类天性，毫无天然生命力，所以是只能用暴力制造、靠暴力维持的 artifact。

至此，我不但悟出了列宁主义诞生的必要性，也明白了伟大领袖为什么要"反修防修"，那是因为共产主义不可能自发产生，所以必须由一小撮人以暴力夺取政权，以国家暴力强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但这种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缺乏天然生命力，因此必须由一代代忠于原教旨的革命领袖使用暴力筑堤打坝，防止私欲的洪水决堤。

因此，共产主义天国蓝图不在地球上实施则已，要实施就只能以暴力推行，以暴力维持，将少数人的意愿强加到全社会头上去，这就是为什么它一定要采取独裁制度，一定要实施恐怖统治。这大概是人类干过的最荒唐的事：冤埋城阙，血染国旗，白骨撑天，饿殍遍地，付出如许惨痛代价，为的不过是一个扶不起来的跛脚鸭！这悲喜剧的发生，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无情嘲弄，它证明了一个偏激学者的妄想不管如何违反人性，无论怎样妨碍生产力，照样可以大幅度干扰改变历史的航

向。

就这样，我不仅找出了马教最原初、最致命的理论缺陷在何处，而且找到了共产革命实践和共产政权组织方式的发生原因，获得了对共运的理论和实践的完整全面认识，从横向与纵向把握了全景。如果我不去作一点点的解剖，还原到最关键的那个假设上，也就不可能得出这种认识。

铁木谈到的西藏问题也可以作类似解剖。他看到的"捆绑思维"，无非是这个现象引起的：

"当汉藏发生冲突时，西方舆论一律同情达赖喇嘛代表的西藏人，谴责北京政府。"

国人认定自己天然在道义上是对的，是受害人而非施暴者，为了解释这种道义上的孤立，便使用"纲式思维"，认为那是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一样，都是为统治阶级豢养控制的。因此，国际舆论一边倒，只反映了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狼子野心。国人为了证明这个认定，便把帝国主义侵略史搬出来，再度进入"痛说革命家史"、大讲特讲阶级仇、民族恨的斑斑血泪账的传统节目，浑不知今夕何夕。

此乃中国人的标准反应定式，几年前我和刘国凯先生论战，他就把蒙古人当年在中国作的孽当成反对蒙独、维护中华帝国的历史依据。比起这位老前辈来，当代愤青的时空错乱似乎跨度还要小得多。

其实思维正常的人只会从那个原始现象入手，作横向解剖，列出导致西方舆论界对达赖与北京的态度差异的一切可能原因：

1、西方对"国家主权"和民族问题的共识与国人认识的歧异。这其实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西方现在处在强调民族自决的后帝国主义时代，而国人的帝国意识才刚刚觉醒，处于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仅指国民民族主义意识而言，公民觉悟则似乎还没到人家大宪章运动时的水平，而政府的专业则是整台胞藏胞无所不用其极，对外人则噤若寒蝉，正如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彰示的那样，与大英帝国政府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完全相反），因此只可能把西方的反应理解为出于卑污的动机。

2、西方舆论界为人类通有的扶危济困、助弱抗强的侠义心肠支配。达赖喇嘛一方享有天然的弱者优势，正如尼赫鲁当年一样。反过来，中方把达赖"集团"当成了帝国主义走狗而倍加痛恨。

3、文明世界对野蛮的极权制度的天然憎恶。北京把这种憎恶解释为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煽起全民激烈反弹，进一步恶化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达赖喇嘛则巧妙地用流亡议会的民主改革迎合了西方价值观。

4、西方出于对西藏历史的隔膜以及近年来越来越强烈的对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原生文化的珍视，认同达赖喇嘛的"文化灭绝"指控。急于发财不顾环境的中国人则毫无此种观念，认为自己是给西藏人带来物质文明各种享受的恩公。

5、北京和萨兰德拉的"庙算"与外交艺术、公关技术水平判若云泥。达赖喇嘛是世上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政治家、外交家，中国外交官员特别是李大牙（Thank God，他总算卸任了）则完全是让文明世界侧目的 goons and thugs。

6、北京实行的新闻管制加重了西方对中国媒体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根本没有公信力，达赖的宣传自然填补了这信用真空。

这就是我这个局外人作的尽可能客观、全面的分析。由此可知，只要这些因素不改变，西方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就不会改变，而北京缺乏改变这些因素的意愿、智慧与能力，只会用鼓动愤青喧闹的龟孙子兵法对付之，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恶感。因此，可以预计，在达赖有生之年，国际社会不会改变现有态度，而"拖死达赖"的英明战略乃是我党唯一能想出来的无可奈何的应对之招。

纵向解剖我其实已经在上面谈清理马克思理论时提到了。它就是福尔摩斯在《血字的研究》中讲的"减法思维"。记得老福在那篇小说里教导华森大夫，一般人只会"正向思维"（他用的术语好像是"加法思维"），亦即看到原因后预想到结果，不会"逆向思维"（他似乎是说"减法思维"），亦即从结果一步步推知原因。我觉得这正是国人的通病，咱们在听到某个结论时，没有逆向思维的习惯，不会去把其中隐含的假设一个个刨出来，再逐一验证之，看它是否成立。全民认同温家宝总理对六四屠城的合理性论证就是范例。

如我在另文提到的，温总理的说法似乎是："过去十五年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当年中国政府对八九风波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这说法隐含着以下基本假设：

1、六四屠城是后继的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有党的领导保障国家安定局面。

3、学运旨在推翻党的领导，不血腥镇压，政府就会被推翻，国家就无法保持安定，当然也就无法保障经济繁荣必需的社会秩序。即使国家不大乱，换上毫无经验的麻烦制造者吾尔开希、王丹、柴玲辈上去，也只会把国家弄得一团糟。

4、屠城是后继经济繁荣的充分条件，中国因此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

对最后一条，就连我这熟悉国人错乱思维的专家，都实在看不出"党道理"来。而且，无论是政府还是党朋都从未做过论证，我甚至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真的敢这么公开主张——哪怕蠢如党朋，也该看出它的荒唐来吧？

如若思和我都指出了的，镇压非但没有解决既有问题，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促成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离心离德，国家在精神上解体，引来国际制裁，国民经济跌入低谷，又遇到了还债高峰，李鹏政府当时真是日坐愁城。全靠后来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港、澳、台、马商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将工厂大量搬迁到中国，才使得中国侥幸

化险为夷。李鹏政府尝到了甜头，才不再抵制改革开放。在老邓南巡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后，政府把疯狂引进外资当成了基本国策，这才造成了后来的经济繁荣，跟镇压有什么鸟相干？

再来看那前三条。第一条乃是结论，后两条则是以列出必要条件链的方式论证第一条，这三条不仅为党朋认同，而且似乎也为大多数国人包括卡城老李那样的海外赤子认同。只是他们习惯了模糊思维，这些想法只朦朦胧胧地存在于他们的下意识之中，从来不曾有人如老芦一样明确列出来罢了。

对第二条我不持异议，假定它确实成立吧，光看第三条，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以下几个假设：

A、不采用镇压手段就不能平息学运。

B、光用常规镇压手段都不行，非得采用大军出动、以坦克装甲车开道、步兵随行、沿街开枪的屠城方式。

C、学运的目的在于推翻共产党。

D、若不镇压，则学运能够推翻共产党，不是全国大乱，就是把王丹等搅 S 棒捧上台。

一旦分解开来，则诸条的谬误立显。

关于 A 点，我已经指出，学运早就多次呈现自然衰退趋势，只要不去刺激它，迟早要自动消亡。其实到了后期都没多少人了，以致学领为了吸引人到广场去，只好建了个民主女神像以广招徕。但那旅游效应也是短暂的，广场上的帐篷里睡的多半是外地来京学生，跟我等当年大串联也差不多，无非是求个免费食宿罢了。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在北京那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熬过三伏天去。“解放”前学运发生过不止一次，那还都有共党在后面组织操控，可也没听说有哪次是永不停息的永动机，而况自发的八九学运？

B 点也是胡说八道。我反复指出过，政府只需使出拖字诀来，拖到学运无疾而终时，把那几个坏头头抓起来押送北大荒，枪打出头鸟之后再连哄带吓，令群众背对背揭发，面对面批判，则大众立即吓得尿不分点地滴。此乃我党专业，都干了几十年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莫非还要我教他们怎么整人？

就算非要清场，那四五运动的规模似乎也不小，老毛怎么就能不流一滴血便轻而易举地荡平了？前段纪念六四，我还想写篇《邓小平不如四人帮》的短文，专作两次运动的对比。四五运动还烧了房子汽车，冲了大会堂，要赖成反革命暴乱还真比八九学运有点理由。饶是如此，指挥镇压的四人帮和吴德等人光靠民兵与大棒就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老邓竟然连四人帮那两下子都没有？

C 点则是诬陷，从无证据证明学运有这种谋划和具体实践。“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

完全是政府犯下的欺骗诽谤罪。

D 点则是梦话。哪怕是被党电影炮制成白痴的国人，除了柴玲以外，都不该加以理会。如果喊口号就能喊垮共产党，则美帝苏修早就被我们打倒无数次了，天天闹学潮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就更不必靠枪杆子去推倒。

至此可知，所谓"屠民治国论"、"屠民繁荣论"都是最劣等的智力垃圾，它之所以获得多数国人认同，只证明了国民平均智力水平惊人的低下。

正如王力雄指出的，一个极权国家在初步松绑时，过去被积压下来的怨气一定会猛然冒出来。此时只要政府处变不惊，应对有方，因势利导，逐步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互动关系，就能把民众一时的不满引导法律轨道上来，使得国家逐步转入常态。不此之图，却大规模动用暴力血洗京城，恐吓百姓，使得政治改革夭折，党国政府成了惊弓之鸟，朝野关系陷入永久性僵局，留下了无穷后患，此乃老邓恼羞成怒、彻底丧失政治智慧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大错。不意竟有如许多的蠢人，以为那证明了他的伟大光荣正确！